

韩国独立运动 与中国关系编年史



[1919 ~ 1949]

【上 卷】

石源华 蒋建忠 /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韩国独立运动 与中国关系编年史

[1919 ~ 1949]

【上 卷】

石源华 蒋建忠 /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出版

目 录

上 卷

绪 论·····	1
一九一九年·····	16
一九二〇年·····	100
一九二一年·····	191
一九二二年·····	238
一九二三年·····	253
一九二四年·····	268
一九二五年·····	276
一九二六年·····	293
一九二七年·····	311
一九二八年·····	338
一九二九年·····	357
一九三〇年·····	385
一九三一年·····	426
一九三二年·····	486
一九三三年·····	538
一九三四年·····	555
一九三五年·····	568
一九三六年·····	587

中 卷

一九三七年·····	605
一九三八年·····	634
一九三九年·····	664
一九四〇年·····	703
一九四一年·····	778
一九四二年·····	868
一九四三年·····	1035

下 卷

一九四四年·····	1155
一九四五年·····	1290
一九四六年·····	1525
一九四七年·····	1577
一九四八年·····	1655
一九四九年·····	1683
主要参考文献·····	1696

绪 论

编撰一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既是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近代中韩关系史的需要，也是我从事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以来的愿望。

我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始于1988年与韩国著名历史学家朴永锡教授相识。他时任韩国史学会会长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是韩国学术界研究韩国独立运动的学术领袖。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学者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朴教授是作为韩国赛艇代表团的成员，趁着来上海参加亚洲赛艇比赛的机会，访问复旦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探路工作的。我的研究专业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算是半个同行。在见面时，他建议我关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1989年12月，他邀请我参加由韩国史学会主办的第14届韩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把我“逼”上了马。虽然此次会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成行，却促使我撰写了有关本课题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南北政府》。^①该论文在会上宣读后，在韩国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首尔的各大报纸作了报道，我迄今依然保存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寄赠的相关报道的一大本剪报。我在文中提出的中、美、苏三大国支持不同的韩国独立运动派别及其在特殊国际背景下各派遭遇不同结局的论点，受到韩国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随后，我对于该课题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以此作为个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新方向和特殊案例，深感该项研究不仅可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推动当今中韩关系发展也有

^① 该文后在国内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着不可低估的影响。1993年4月和1994年4月，我两次应邀赴韩参加韩国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会主办的纪念韩国临时政府成立74、75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与韩国学术界建立了更加广泛的联系。1995年9月，我赴台湾访问，有机会见到中国学界研究韩国独立运动史的前辈专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胡春惠教授，获赠佳著，当面请教，得益良多。^①随后，我先后担任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海外史料委员、韩国国家报勋处特聘独立运动研究委员、韩国国会图书馆特聘顾问和谘询委员等，积极参与推动中韩之间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从1995年起，我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有关韩国独立运动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7次，^②主编或合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4本，^③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0年4月至1992年1月，我赴日本访问研修，将该课题列为研究项目之一，收集到一些在国内难以见到的史料以及日本学者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研究成果。1999年和2007年，我分别应中国国民党蒋中正文教基金会理事长秦孝仪先生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研究员的邀请，两次专程赴台，访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国史馆”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集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档案史料，收获颇丰。1997年，经我穿针引线，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与上海市档案馆合作，并由我和马长林先生主持编纂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地域韩人团体关系史料汇编》。^④在此前后，我先后访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① 胡春惠先生著《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6），首次综合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藏丰富档案，为中国学术界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

② 这些会议分别是1995年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由该中心与韩国现代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纪念韩国独立光复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99年由该中心主办的“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由该中心主办的“申圭植、闵石麟与中韩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由该中心主办的“金九与中韩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由该中心主办的“纪念朝鲜义勇队创建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2009年由该中心和与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③ 这些论文集分别是《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80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申圭植、闵石麟与中韩关系》（金俊烨、石源华合编，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地域韩人团体关系史料汇编》（二），东方出版中心，1999。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江苏省档案馆、延边大学朝鲜研究所等，收集相关的档案史料。这些一手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奠定了我编撰《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的史料基础。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对于该课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基本史料的汇集，还是基本史实的梳理，都有大量工作需要做，而深层次的研究工作更有待今后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该课题的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是在与中国学术界互不交流而且极少使用中文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运用中文资料为主，兼而运用韩、英、俄、日文资料，编撰一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对于进一步综合、梳理已经发现的档案资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推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该书在内容上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为中心，旁及其他相关的内容，是我编撰“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的一次初步尝试，且该书出版后得到广泛引用。曾经参加过朝鲜独立运动的老战士、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文正一先生，朝鲜义勇军老前辈金刚先生给我来信，热情鼓励，希望我能就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些资料及其线索。1997年，我完成了该书的姐妹篇《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体裁与上书相同。1999年，该书韩文简译本首先由韩国高句丽出版社出版。2000年，该书增订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编撰“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的又一次尝试。在此前后，我还完成并出版了专著《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①《金若山将军传》、^②《中韩文化协会研究》、^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等，^④主编出版了《韩国独立运动党派与社团研究》、^⑤《〈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等，^⑥其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一书的附

① 石源华著《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 石源华著《金若山将军传》，韩国高句丽出版社，1998。

③ 石源华著《中韩文化协会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④ 石源华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⑤ 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党派与社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⑥ 石源华主编《〈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录《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史料长编（1945～1949年）》，对于上述两书没有涉及的战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作了全景式的扫描。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撰确定了基本框架和工作基础。

当我撰写第一篇相关论文时，刚入“不惑”之年，如今已过“花甲”了。编撰《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是完成个人的一个夙愿，也是对于20多年相关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本书将承继前述《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的体裁和框架，采用按年、月、日排列的方式，将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文献、活动、人物等逐天编排、叙述、评点，并保存若干重要历史文献资料的原文或节录，每个年度均编撰内容提要，勾勒每年的重要事件及年代特征，努力为后人提供一部翔实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

二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陆续探索和研究了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先后撰写了40余篇学术论文。2009年，在民族出版社禹社长的鼎力支持下，我将这些研究论文的精华编辑而成《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上下卷），^①上卷集中了1989～1998年间发表的主要论文，下卷集中了1999～2008年间发表的主要论文。从上下卷不仅可见在两个10年间我研究问题的关注角度和取向有所不同，也可见我在两个阶段中学术水准的提升。文中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在本书的编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较好体现了个人的研究特色，涉及的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定位。

韩国独立运动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并列为20世纪远东的三大革命运动。中韩两国人民亲密合作，并肩战斗，谱写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篇章，构成了近代中国史、韩国史和中韩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中国因此成为韩国独立复国运动的中心和主要活动基地。

然而，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研究的历史定位，长期以来却受到西方史学传统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中，历来以美、英、苏等大国为中

^① 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上下卷），民族出版社，2009。本书获第十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心，中国、韩国等东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不被重视，常常是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不提。韩国独立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在现代世界史上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本编年史的编撰将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正确定位韩国独立复国运动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详尽的历史叙述显现以下主要论点。

韩国独立运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最早、抵抗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始于1905年日韩签署“保护条约”后爆发的义兵运动和爱国启蒙运动，以1919年的“三一”运动为标志，形成全国性的反日斗争高潮，产生了世界性的重要影响。自此以后，韩国成为亚洲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先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韩人爱国团策动尹奉吉义士虹口公园掷弹事件，一举击毙侵华日军首脑白川大将，震惊世界。韩国人民积极参与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反日斗争，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与中国抗日战争融为一体，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沦陷区形成了三支互不统辖的韩民族抗日武装力量，成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国际纵队，担负着支持中国抗战和完成韩国独立的双重使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追随美、英、中等国宣布对日宣战，不仅领导韩国光复军继续与中国军队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而且还派出人员赴印度与联合国军共同对日作战。在战争结束前夕，该临时政府还与美国军方合作，培训特殊军用人才，并积极筹备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联合国军登陆朝鲜半岛。而战斗在敌后根据地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以及在苏联境内集训的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籍革命者也迅速行动，在不同的地域参加对日作战，积极壮大队伍，参加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战争。韩国光复的实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之一。

韩国独立运动是世界反殖反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侵占朝鲜为其殖民地，是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欺压弱小民族的典型案例。韩国反日独立运动是世界民族主义战胜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19年“三一”运动前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和平宣言”的影响下，朝鲜共产党、独立党、社会党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应运而生，领导韩国国民在韩国国内和海外聚居地为反对日本强占朝鲜的殖民主义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与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等东方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互相呼应、互相支持，

共同为埋葬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国独立运动各党各派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在开罗会议后，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同盟各国政府正式承认而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催促同盟国“迅速承认临时政府，并给韩国以作战物资的援助，使韩国国内抗日斗争能够展开”。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以及在苏联境内活动的中国东北抗联队伍中的朝鲜革命者，也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积累和扩大自身的力量，为埋葬日本殖民者做了重要的准备。韩国光复的历史性成果，彻底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半岛 35 年的殖民统治，这不仅是韩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更是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伟大胜利，在世界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国独立运动是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专制主义曾经统治朝鲜半岛达数千年之久。韩国在近代的衰落和遭遇日本灭国之灾，与朝鲜王朝的封建腐朽统治密不可分。韩国独立复国运动兼具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性质。韩国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究竟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是实现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还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李氏王朝，曾经成为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长期争执的重大问题之一。在韩国独立运动内部存在着两个系列的政治主张：一是以复辟李朝统治为目标的民族传统主义的抗日独立运动团体，如大韩独立团、纪元独立团、大韩军统府、义军府等，他们主张恢复君主政体的国家；二是以实现民主共和为目标的民主主义系列的抗日民族运动团体，如耕学社、韩族会、大韩统义府、参义府、正义府等，他们主张独立后建设共和政体的近代民族国家。^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经历过五次“改宪”，其政治体制经历了“国务总理制”——“大统领制”——“国务领制”——“国务委员制”——“主席制”——“主席副主席制”等重要的变化，但民主主义和共和政体始终占主导地位。该政府的施政理念“三均主义”是综合西方民主主义、苏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华的结晶。^② 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革命者更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那些主张复辟李氏王朝的思想，虽然作为韩国独立运动中的一种流派曾经长期存在，但始终未能居主

① [韩] 赵恒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政治主张及其正统性》，载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第 188～189 页。

② 石源华著《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第 106～114 页。

导地位，也没有出现类似中国历史上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样的政治闹剧。韩国光复的实现意味着在朝鲜半岛彻底埋葬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生存基础，在北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南方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范围内民主主义对于封建主义斗争的一个历史性胜利。

韩国独立光复对于中韩关系的影响也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中韩两国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是确保东北亚安全和平的重要保证。这一历史进程由于日本先是否并朝鲜后是侵略中国而告中断。中国朝野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数十年如一日地支持和帮助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各党派、各阶层人士都将帮助韩国独立运动看做中国自身的事情。抗日战争期间，韩国独立运动三大系列的志士在不同的区域得到了中国各党派和人民的无私支持和全方位的援助。中国人民将抗战到底的“底”定位为恢复朝鲜的独立，而不仅仅是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的国土。在著名的开罗会议上，中国政府力主战后立即给予韩国独立，《开罗宣言》成为韩国摆脱日本殖民地地位的国际法律文件，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最重要象征。韩国独立光复与中国抗日战争同步胜利，彻底打败了近代危害东北亚安全的主要敌手——日本法西斯，使韩国得以实现独立，也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变化；不仅对于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对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韩国独立运动的特殊形态和战后朝鲜半岛的分裂，对于战后远东和世界的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与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革命是以革命的武力打倒反革命的武力，实现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胜利；越南独立是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为主要特征；印度独立是长期开展“不合作运动”，实现非暴力的革命运动，最终迫使英国殖民者同意印度独立；菲律宾独立则是在美国的同意和支持下，实施分阶段独立方案；而韩国独立运动主要是在国外（中国、美国、苏俄等）进行，未能在其国内形成反日独立复国的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基础。战争后期，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都曾试图计划组织地下军返回国内，配合和迎接盟军进攻朝鲜半岛，但这些计划未及实现，战争就突然结束，这对于战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命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韩国光复主要是靠同盟国的军队实现的。美、苏军队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南北部，导致朝鲜半岛分裂，在美、苏的分别支持下，朝鲜半岛南北部分别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0年发生的朝鲜战争更使南北分裂固定化，不仅影响了朝鲜半岛的

前途，而且成为世界冷战格局升级的重要原因。朝鲜半岛成为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其影响也是具有世界性的。^①

第二，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对象。

在韩国，冷战和朝鲜战争以及南北双方现实的政治对立，影响了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以及对华关系历史的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南北双方的学者基本上都只研究有利于本方的党派，对对方党派的独立奋斗历史或是不提，或是批评，甚至予以攻击。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关系，也基本上反映南北双方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首先是名称问题，北方称为“朝鲜独立运动”，南方则坚持称“韩国独立运动”，而近代历史上“朝鲜”、“韩国”、“高丽”从来都是混同使用的。名称之争完全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而起，在学理上毫无意义。对于“三一”运动，北方称起因于外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内受国民会影响，南方则强调起因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和天道教、基督教等教会的影响及作用。北方强调运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南方则认为运动的主力是教会的教徒。北方认为运动的地点是从平壤开始发展到全国，南方则坚持运动首先是从当时的京城汉城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双方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更是南辕北辙，北方指责该政府是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中“袖手旁观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海外组成的‘亡命团体’”，“在搞民族主义运动的幌子下，进行事大主义的卖国卖族活动”，“从爱国同胞那里刮去很多财物，并把它们揣入私囊”，“挥霍殆尽”等。南方则认为今天的韩国政府即渊源于当年的韩国临时政府，反复论证该政府的法统性，进而论证现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全盘否定金日成派的抗日活动，并制定法律严禁宣传共产主义派的抗日活动，以此否定北方政权的合法性。韩国学界对于独立运动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以政治需要歪曲历史真实面貌；二是双方情绪对立，不能平静客观研讨问题；三是制定制约对方的法律，使正常的研究工作成为不可能。^②

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对象也同样受到意识形态和中朝特殊关系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对于韩国临时政府为

① 本节内容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在近现代世界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下卷），第3~11页。

② 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评价与朝鲜半岛统一》，载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下卷），第14~15页。

代表的党派团体持批评态度，而且对于中国国民党援助韩国的独立运动持否定态度，使该领域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对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延安派”的抗日斗争，则由于中朝之间的特别约定而避讳如深，^①迄今没有开放相关的档案，导致对于这部分朝鲜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出现缺失。

本编年史的编撰将尽力全面反映韩国独立运动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全貌。日本灭亡韩国后，韩国侨民在中国进行的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其地域之广、人数之众、党派之多、时间之长、斗争之烈、牺牲之大，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如美国、苏联、日本等地韩国侨民聚居地的独立运动是最为突出的，为韩国的独立光复作出的贡献也最大。在中国的韩国各抗日阶级、各抗日党派都参加了韩国独立复国斗争，就其政治影响和历史作用而言，最主要的有三股互不相辖的政治势力。

其一是在中国东北沦陷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活动的以金日成、崔庸健为代表的朝鲜抗日革命力量。战时，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斗争队伍的组成部分，曾随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进行整训，战后随苏军返回朝鲜国内，参与创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其二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并肩战斗的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战后部分回国参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建，部分留在中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前后返回朝鲜，被称为“延安派”，他们在朝鲜的处境颇为特殊。

其三是长期在中国关内地区活动的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和领导下的韩国反日运动各党派。他们派系林立，互相对立，但都与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中国官方全方位的积极援助，战后大部分返回韩国，参与了大韩民国的创建，但在韩国政治生活中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也有少数领导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从事政治活动。

尽管这些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政治信仰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参与斗争方式不同、战后政治取向和最终结局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为韩国独立复国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与中国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建立了程度不同的

^① 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发生整肃“延安派”的政治斗争，对于“延安派”斗争史的评价成为两党间的政治敏感问题。——编者注

密切联系。他们的奋斗正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建国的基础，也是今天中韩、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编年史将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采取公正不偏袒的历史态度，全面客观地反映韩国独立运动三大系列开展反日复国斗争的全貌，同时也全面、客观记录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各党派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撰写一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信史存世。

第三，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意义。

对于中韩友好关系发展的数千年历史而言，最能体现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内容是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明朝政府援助朝鲜抗倭战争以及近代中国朝野援助韩国独立运动。加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推进近代中韩关系史和中韩两国反对日本侵略斗争史的研究，而且对进一步发展中韩关系史本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天韩之间发生若干历史问题争执、两国民间出现文化冲突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入开展韩国反日复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本编年史将以详尽的史料和充足的历史事实证明：如同有着数千年交流历史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于朝鲜半岛具有的重要影响一样，近代中韩两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及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情谊，将成为奠定和发展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政治资源和历史动力。

本编年史将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中国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帮助。从宏观层面，包括声援韩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日复国斗争、协助韩国独立运动开办军事学校培养军政干部、批准组建和支持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活动、开罗会议确定战后朝鲜的独立地位、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帮助韩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创建会议、以特殊方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在华活动等等；从微观层面，包括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分别制定各种援韩的具体政策，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政务活动费、军务活动费、秘密活动费、侨民生活费等之拨付，乃至战时购粮、购药、治病、上学等特殊照顾等，生动地体现中韩两个民族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并肩战斗的历程。并确信这些历史事实将有助于推动今天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

第四，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新动向。

在整个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是阻挡正确客观评价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阻碍正确客观评价韩国独立运动

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思想倾向。在本编年史的编撰过程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把握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韩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后，两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中韩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历史问题争端，有的问题如高句丽历史问题等甚至一度达到比较尖锐的程度。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本来，中韩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双方共同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危害，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抗日战争有着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援。韩国老一辈学者一般都抱着感激的心情描述和研究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韩国国家报勋处曾经代表韩国政府授予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20多位中国国民党高层人士“韩国独立勋章”，表彰他们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杰出贡献。韩国各地纪念独立运动的纪念馆也都以尊敬的态度颂扬中国人民对于韩国人民反日复国斗争的支持和援助。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严谨的韩国学者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颂扬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战斗情谊。然而，最近几年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声音。2009年4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位韩国重要政府机关的官方学者，撰文认为韩国临时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后的主要外交努力方向已经转向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援助，批评中国官方阻挡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与西方的联络，指责当时的中国政府企图独霸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控制权。^①2010年12月，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举办的“韩中交流合作的历史与未来展望”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韩国著名大学的某教授撰文重评韩国临时政府与韩中合作，提出要对日本统治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和中国的合作关系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诠释”，主张“不应一味从善意层面出发进行夸大宣传”，其批判指向十分明确。该文认为：关于中国帮助韩人培训军政干部，中国“并非基于‘平等友谊’，也不是反帝国主义观点，而是将其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附属力量”。中国并非将韩国光复军“视为主权平等的抗日战线同盟，而是视为援军，其中蕴含着中华主义的霸权意识”，“从广义上看，则是扩大中国对周边亚

①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等编《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未刊本），2009。

洲地区的影响力的一种中华主义”。该文批评“中国政府在承认临时政府问题上，采取双重态度”，指出中国政府在《开罗宣言》前后，很早就对韩国信托统治问题表示同意，并在后来“将其用作确保半岛的发言权，将临时政府绑在自己身边的手段”，指责中国认为“韩国的独立问题最好能够搁浅下来，若韩国问题长期成为悬案，那么美英两国将会尊重中国的立场，中国介入其中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通过束缚临时政府，确保自身战后对韩半岛的影响力，并对战后苏联可能使出的战术加以应对。”该文的结论更加“骇人听闻”：“在日本统治时期抗日共同斗争这一目标下的韩中‘合作关系，对临时政府而言，可谓是‘丧权辱国’一般的屈辱过程。”^① 这些奇谈怪论反映了部分韩国民族主义学者主张“重新研究历史”，不管这些学者的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会歪曲中韩关系的历史真实面貌。

本编年史的编撰将重视辨正这些违反历史事实的论点，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但本书不取直接辩驳的方式进行驳斥和论战，而是逐日编排历史事实，说明历史真相，如中国政府如何保护受到日本追缉的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如何顶住日本的抗议和压力秘密帮助韩国培养了450多位军政干部，如何在自身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确保战时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如何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何首先在开罗会议上提出并坚持战后韩国独立国际地位的确定，如何无数次与美国政府交涉希望美国与中国一起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为“流亡政府”，如何帮助韩国派遣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创建大会，如何为了韩国临时政府及时返国而与美国军方进行艰苦的交涉等，本编年史将以事实说明真实的历史，让那些奇谈怪论不攻自破。

第五，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资料与问题。

编撰一部具有学术分量的编年史是我长期的愿望，20余年来，我一直为搜寻历史资料而不断努力。本编年史使用的资料比较广泛，大致可分为以下若干部分。

首先是韩方已编纂出版的重要资料集。重要者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篇、韩国国家报勋处编《海外韩国独立运动史

^①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韩中交流合作的历史和未来展望国际会议论文集》（未刊本），2010。